


M
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DUOWEIDUSIKAO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的多维度思考

袁强 李海平 刘慧卿 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M
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DUOWEIDUSIKAO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的多维度思考

袁强 李海平 刘慧卿 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度思考 / 袁强, 李海平,
刘慧卿编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601-8291-9

I. ①马… II. ①袁… ②李… ③刘… III. ①马克思
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676 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度思考
作 者: 袁强 李海平 刘慧卿 编著

责任编辑: 孟亚黎 责任校对: 柳燕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420 千字
ISBN 978-7-5601-8291-9

封面设计: 王菊红
北京市登峰印刷厂 印刷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代共产党人始终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这标志着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然是一项常提常新的课题,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维度研究也必然是一项复杂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课题。本书正是在对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相关学者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撰写的,并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自然维度、他然维度和实然维度方面的系统内容,以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借鉴。

通览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和创新:一是本书全面、全体系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并正确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因此,本书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特点。二是本书还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新闻学、法学、历史学、文艺学等视角出发,分类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运用、发展和创新,这就做到了:一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各学科思想,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主义各学科思想的中国化进行了详尽阐述。因此,本书具有层次性和实用性特点。三是本书首先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类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各学科思想的中国化情况,进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理论创新和现代化道路,这样在结构逻辑上遵循了总一分一总的思路,从内容逻辑上遵循了原理—理论—实践的思路。因此,本书具有综合性和逻辑性特点。

本书共分为三篇、十二章内容。首先,第一篇包含了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概述;其次,第二篇包含了第四章到第九章的内容,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新闻学等视角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最后,第三篇包含了第十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创新,并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进程。

全书有袁强、李海平、刘慧卿撰写,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至第三章、第九章第二节至第三节、第十一章:袁强(西南科技大学);

第四章、第六章至第八章:李海平(太原科技大学);

第五章、第九章第一节、第十章、第十二章:刘慧卿(大连交通大学)。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首先,我们引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在此谨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其次,我们还借鉴了国内外很多相

关的研究成果及期刊、著作、论文等,在此也对有关的学者、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书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所以,作者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作 者

2012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涵义	(7)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2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2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划分及其特点	(2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多维度分析	(37)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45)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	(45)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55)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维度	(6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	(6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构	(7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反思	(86)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学维度	(90)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概述	(90)
第二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9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与当代中国	(105)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学维度	(11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11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12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	(129)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学维度	(13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概述	(132)
第二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143)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当代意义	(155)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学维度	(157)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及其传播	(157)
第二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163)
第三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当代价值	(172)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学科维度审视·····	(179)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179)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186)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194)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20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20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213)
第三节 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216)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22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224)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	(22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237)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进程·····	(247)
第一节 “西化”之路与“以俄为师”·····	(247)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	(249)
第三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260)
参考文献·····	(26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初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关注的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以来,其中国化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渐演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也在最初论述的基础上获得了不断的延伸、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被概括和总结出来的。可以说,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探索和思考的理论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艰辛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产物。

(一)我党建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初步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欧洲社会,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属于一种西方思潮。文艺复兴自16世纪兴盛于欧洲开始,这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序幕。从资本主义的逐步萌芽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这三百多年间,工业化正在逐步发展,机器大工业日渐发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与西方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当时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为了救国救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企图使中国走上改良的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在我们迷茫之际,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适用的社会条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距,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进行革命之际,所以,我党最初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例如: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放到它适用的具体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当时也有部分共产党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了把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国的现状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连结起来进行研究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早期,我党已经初步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我国,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能脱离了我国的现实。

由于历史局限,我党在建立初期,并没有立即实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历史条件的局限下,我党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有所欠缺,致使党的一些纲领和决议都带有机械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照搬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中共一大提出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无形中是照搬了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诸如我党曾有这样的认识,认为我们应该完全保持独立,不与其他任何党派建立关系,只对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维护。但是,随着我党的不断成长,在中共一大后,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多次运动,在这些过程中,我党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态度。1922年1月,《先驱》提出要在中国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努力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合适的方案。这就直接表达了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意向,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事实上已经开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到一起了。中共二大坚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纲领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良好开端。在之后的中共三大,我党针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做出了开展党内合作的重要决定。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参加革命的阶级成分异常众多且复杂,革命形势有些不容乐观,为了使我国革命顺利地发展,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由于我党早期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客观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的,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前奏

20世纪20年代末,在我党内部,曾一度有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趋势,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被神圣化,用僵化的模式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后患无穷。毛泽东及时指出了这种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秋收起义遭受了失败之后,毛泽东冷静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客观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关于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初步论证。这对我国革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基本上解决了大革

命失败以后我党怎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的课题。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未清晰的认识到。在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争论不断,这些争论主要围绕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道路问题。这些争论对全党思想的统一的起着负面的消极作用,阻碍了革命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总结这些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反复、深入地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思考,最后,他发现这些争论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之间的斗争。因此,要想使全党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首先要坚决摒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不良风气,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有着重大贡献。到1929年中共九大召开时,毛泽东提出了如何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毛泽东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其二,告诫党员同志坚持调查研究,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其实,在这里,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了。《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著作,这里的“本本”,就是僵化的理论,毛泽东说,我们要在掌握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并把它运用到我国的实际中。这篇文章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也可以说,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基本确立,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先导。然而,由于当时党内的斗争,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内还没有得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并没有完全被全党接受,导致后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能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遵义会议吹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角,它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了我们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转变也从外部环境上为我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指出,在今后的任务中,每个国家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立足于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本国的实际问题中,避免机械地直接套用前人的经验。由于我党刚刚遭受了一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之中,可以说,共产国际七大对我党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意义重大。我党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例如: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做法。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要将共产国际决议民族化的观点,使共产国际的决议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两篇著作中,其核心观点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在这个文件中,我党指出了我国革命的复杂性,指出了我们所面对的敌人的复杂性,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搬套用,这个相结合是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由此可见,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等提法,已经是“中国化”概念的前奏了。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路线。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我党的大局掌握在毛泽东等人手中。在这时,我党内部弥漫着“左”和右的错误思想,我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遭遇了阻力,唯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党成立以来走过的曲折历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明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经验的态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一命题得到大家的一直认可。毛泽东认为,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具有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民族化”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它只有应用于具体的客观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对其产生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要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以中国的具体现实情况为基础,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情况,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只有这样,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标志着我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科学化、规范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到中共七大这段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党指出,我们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党的工作也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苏联革命的经验与我国的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具有意义,才能有实际效果,我们要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到具体的革命斗争和理论建设中去。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艾思奇、邓拓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也多次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内广泛运用,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在中共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体系正式得到确立。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我党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框架,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我党上下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广泛的认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王稼祥于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①在这之后,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阐述,在这些不同的阐述中,有一个共通点: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国的正确理论。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发展的同时并完善着,它既是中国化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我们的建党建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正式写入党章,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得到全党上下的广泛认同。

^① 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第344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次重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一度放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我党历史上曾一度被放弃。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场合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更多使用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提法。这种提法首次被提出是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上,在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被重申,由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提法成为了我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国外经验问题上的标准化的提法。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种提法上,有着一定的区别。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是科学、准确的,这种提法简洁易懂,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提法在学术上更加精确,实则这两种提法所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尽管此后毛泽东一般不再用该提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该提法仍经常出现在会议、报纸、刊物之上,因为该提法言简意赅、通俗明了。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种提法常常被同时采用。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由于一些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曾在一段时期内被人们很少地使用,但是很少使用并不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我党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一般就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了,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我国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毛泽东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现实情况“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经历了失败与挫折,也走过很大的弯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历经千辛万险才取得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我们必须独立自主,深入了解我国国情,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现实结合起来,以此为依据,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这里所指的“第二次”结合,是指在时间角度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针对中苏两党的争论,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进行了解释。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认为苏联的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这如同树干和枝叶的关系。通过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出,我党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正确的命题,并且一直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懈努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虽然邓小平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他一直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使得更多的国外思潮传入我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在对待国外经验时,要采用科学、合理的态度,借鉴其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决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历史上的沉痛教训。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此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的论断,并在这一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在这一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最终被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这种变化同时代主题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问题。特别是在新时期,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问题凸显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成果。江泽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置于国内外发展的新变化下,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相结合。邓小平理论在中共十五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共十六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之后,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频繁出现于党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中和各种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民群众中的熟知度大大提高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具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必将发生变化。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利益分配机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理论的回答。胡锦涛同志向全党明确提出了继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①在新的世纪,我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永远适用于中国。回顾我党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我党的历史是一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历史,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客观实际

^① 胡锦涛.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03-12-27

紧密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不断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由此可见,重新使用和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绝非偶然,而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剖析和准确把握。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向问题上,胡锦涛同志认为,我们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客观情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重视理论创新,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新的理论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得到最大的发挥,以此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的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体现出来,注意时代的变化,对时代特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对时代要求要能准确反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也体现出来,从而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高度关注人,尊重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和无比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涵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包含以下含义: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作为一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在一般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对任何国家都通用的普遍真理。例如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认识论等等。但是这里的普适性是指世界观、方法论等只有当其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变成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时,其价值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在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客观现实情况相结合,坚持实践性、时代性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策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

义具体化的直接表现。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本身属于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形态,是具有民族性和民族形式的。这里的民族形式主要指其所体现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有着鲜明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中体现着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其他国家时,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加改造地原封不动地应用到世界其他民族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功能将得不到发挥,马克思主义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要想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撑,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赋予其中国风格,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民族化的表达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这方面的光辉范例。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作为一种经典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

后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习得的。要想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解读。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只是理论知识。只有将书本中的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学以致用,书本中的知识也才有了意义。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式。这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仅适应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是正确的理论,而且其基本理论就是在今天仍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要原封不动地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搬到今天的实际中来用,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所以,我们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赋予时代的血液,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其一,我们要使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解决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二,我们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理论,但是,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一国的客观现实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客观现实相结合,在实践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展示其生机的关键所在,同时对于我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传入我国的初期,我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很好地进行结合,我党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以后的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转化为实践形式,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只有把理论运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历史表明,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向实践形式的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其他转化都以此为目的并为此服务。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现代化、实践化相统一的

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结晶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

1.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仁人志士、先进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尝试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政治思想,也进行过一些运动,但是却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使中华民族独立,没有使人民当家作主。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付出巨大代价后作出的正确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同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性的思想武器。

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一再强调:无论在任何时候,首要的一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遵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能丢。无论时代怎样发展,都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念,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就会丧失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够给我们的事业以科学的指导,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能够为我们自身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

2. 实现民族复兴、巩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定主题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最终表现。在我国,消灭剥削,消除一切压迫,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事业奋斗的崇高目标。这一主题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找到,同时,这一主题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中。要想实现民族的复兴、巩固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与使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努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内容和任务,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又会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状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色,这就要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领导力量,立足于本国的时代背景,各有侧重地解决自己时代的主要课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中,其中,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围绕如何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课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围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课题展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课题展开的,邓小平旨在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从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发展观则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人为核心,围绕当代中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而展开的。这几大理论成果的主题是一致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连

续性的篇章。

3. 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原理包含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是以一国的客观实际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只有与一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这个国家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精神指导武器,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总结十月革命给无产阶级提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经验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准确、透彻、全新的分析,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也就是先夺取农村政权、在夺取城市政权的道路,这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完全相反的。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邓小平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国情的研究放在首要的位置,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在国际化舞台的新发展,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准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将我国的发展与世界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在我国现在还将长时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基础上,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分析了在此基础上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出现了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党肩上的任务更加艰巨,人民对党的期望更大;党的群众基础在不断扩大,党员数量增多,党员成分多样性了,一些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毒化了,腐败问题是我党的一大问题,党的自身建设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对这些新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时,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指导中国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的历史。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斗争的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摒弃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毒瘤,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加以科学地概括总结,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是随着实际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打倒,国人的思想被严重禁锢。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我国改革的号角。在新的时